

汉字造成词语“重新分析”*

杨 锡 彭**

〈目 次〉

I. 绪论	III. 从汉字所使用的符号看汉字造成词语“重新分析”
II. 从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看汉字造成词语“重新分析”	IV. 总结

I. 绪论

“概念的转化在语言结构上造成的影响无过于重新分析”，Langacker给“重新分析”的定义是：没有改变表层表达形式的结构变化。一个可分析为(A, B), C的结构，经过重新分析后，变成了A, (B, C)。¹⁾考察“重新分析”(Reanalysis)的涵义，所谓“重新分析”(Reanalysis)实际上是概念的转化造成语言结构上的变化，是反映认知变化的语言实体单位的结构、意义、功能的变化。

现今运用重新分析(Reanalysis)这一概念，几乎没有注意到汉字的影响造成的词语内部结构、内部形式的重新分析(Reanalysis)。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并不只有记录汉语的功能，汉字也会对汉语产生反作用(即反过来影响

* 感谢东国大学校(庆州)中语中文学科姜宗姪教授对本文写作的鼓励和诸多帮助；感谢《中国语文学报》编辑部对本文的编辑、修订，他们所做的工作令我感动。

** 东国大学校(庆州) 中语中文学科 教授。

1) 孙朝奋, <《虚化论》评介>, 《国外语言学》1994年 第4期, 第23页。

汉语), 使得汉语语言实体单位发生形式、意义、功能等方面的变化。汉字的书写形式可能改变词的内部结构和内部形式(词义的表现方式), 2) 导致词的结构、功能和意义发生“重新分析”(Reanalysis), 这是汉字影响汉语的重要表现。

II. 从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看汉字造成词语“重新分析”³⁾

1. 从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符号的符号这一层面看, 绝大多数单字都是音、义、形(字形)三位一体的, 因此造成了每个字都有意义的汉字认知倾向,⁴⁾ 在这一认知倾向的驱动下, 没有意义的字也会变成有意义, 从而使复音单纯词分解出内部结构和内部形式。

众所周知的例子是“望洋兴叹”的意义变异。“望洋兴叹”出自《庄子》, “望洋”本为联绵词, 形容抬头向上看的样子。但由于望文生义, 把“望洋”理解为“(眼睛)望着(海)洋”, 也就是把本是意义囫圇一团的联绵词“望洋”分解为各自有意义的“望”和“洋”, 在语用中又类推出“望山兴叹、望房兴叹、望水兴叹”等说法。在“重新分析”(Reanalysis)中, “望洋”二字分解为两个有意义的单位, 其间也就有了内部结构和内部形式。

又如“鸳鸯”本为联绵词, 在历史上附会出“雄曰鸳, 雌曰鸯”的解释; 在语用中, “鸳”常用作“鸳鸯”的代称独用(陆佃《埤雅》“鹊好外反, 鸳好内思”; 柳永《两同心》“鸳会阻, 夕雨凄飞”), 或参与构词(鸳枕、鸳侣), 这样“鸳鸯”的意义就发生了解解, 并且有了诸如“鸳死鸯随”之类的说法, “鸳”“鸯”

2) 词的内部结构指词的内部语法构造, 内部形式指词义的表现方式或表现形式。详细解释请参看刘叔新《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 《中国语文》1990年 第4期。

3) 本文对于汉字造成词语“重新分析”从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和汉字所使用的符号这两个层面的特点来进行分析。裘锡圭认为, 汉字的性质应从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符号的符号和文字所使用的符号这两个层面来认识。请参看裘锡圭《汉字的性质》, 《中国语文》1985年, 第1期。

4) 参见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 商务印书馆, 1979, 第79页。

这两个非语素音节变成了语素音节，“鸳鸯”也就成了并列结构的复合词。如此一来，“鸳鸯”就有了内部结构和内部形式。类似的例子是很多的。

音译外来词也有因认知倾向而“重新分析”(Reanalysis)之例。“蘑菇”是来自蒙古语的音译词，“蘑菇”本是囫圇一体的，两个音节、两个字只表示一个最小的意义单位。但在语用中，“蘑”和“菇”各自作为“蘑菇”的代称参与组合，构造了“鲜蘑、口蘑、松蘑、猴头蘑”“草菇、平菇、香菇、金针菇、茶树菇”等词语，“蘑”和“菇”就都有了意义，甚至可以各自独立成词。“蘑”、“菇”的语素化反过来影响“蘑菇”的意义辨识和结构分析，“蘑菇”也就有了内部结构和内部形式。

音意兼译的外来词的形成也是因认知倾向导致“重新分析”(Reanalysis)的结果。gene译为“基因”、bandage译为“绷带”、fuzzy译为“弗晰”，在兼顾外语词语音的同时，译音用字的原有意义构成的词义也与外语词的意义相似或相当，这就形成了不同于纯粹音译外来词的内部结构和内部形式。不过要说明的是，音译词用字可能形成字面上的意义组合，但不一定与外语源词的意义相关，因此只是“谐音别解”，⁵⁾其实是没有内部结构或内部形式的。例如英语的gentleman译为“尖头鳗”，字面意义是尖头的鳗鱼，但这个意义与gentleman的意义无关，也与“尖头鳗”的实际意义无关。因此“尖头鳗”并没有与词义相关的结构关系、内部形式。又如Esperanto(世界语)历史上曾有“爱斯不兰托”的译名，改为“爱斯不难读”，字面上有意义，但字面意义与词的内部结构、内部形式无关，或者说词义并不是字面意义表示的意义。因此，“尖头鳗”、“爱斯不难读”之类与“基因”等是不同的。

2. 虽然绝大多数汉字都是有意义的，但有意义的单字也可以作为纯粹的记音符号来使用，作为记音符号的单字原有的意义却歪曲了词的内部形式或单字所记录的语言符号的音、义、形(字形)之间的关系，从而使语词的内部结构、内部形式发生变异。

5) 所谓“谐音别解”，请参见杨锡彭《汉语外来词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40-42页。

最常见的是俗语词或口语词在书面上采用记录方言口音的俗别字或音近替代字记写，使得一些词语的既有内部结构和内部形式发生“重新分析”(Reanalysis)。例如上海民居“石库门”，其特点是用条石砌成门框，俗称“石箍门”，即以条石“箍”成的门框，“石箍门”遂成这类民居的代称。在坊间记写中，“箍”字写成了音近且通俗、易写的“库”字，“石箍门”就变成了“石库门”。“石库”二字表面上看起来是有内部结构、内部形式的，其实已失去理据，内部形式也是不清楚的。从“石箍门”到“石库门”的变化，实际上内部结构和内部形式已经发生“重新分析”(Reanalysis)。

采用记音字“如实”记录口语词的读音，往往会导致口语词的理据消失，或造成词语的内部结构和内部形式发生变化。北京方言词“眼力见儿”应是“眼力劲儿”，“劲、见”儿化后读音相同，“见儿”实为“劲儿”的误写。“眼力见儿”的内部结构、内部形式、理据都是似是而非的。

《现代汉语词典》收有“猴年马月”，但没有直接释义，只注以“见××页【驴年马月】”。查“驴年马月”：“指不可知的年月(就事情遥遥无期、不能实现说)……也说猴年马月。”这个释义并不错，但没有解释何以用“驴年/猴年、马月”对举来比喻“事情遥遥无期、不能实现”。“猴年马月”看似有内部结构和内部形式，其实是无理据的，因为只有“猴年”，并无“马月”。至于何以用“猴年马月”表示不可知的年月以及比喻事情遥遥无期、不能实现，更是无从解释。其实，“猴年马月”中的“猴、马”是天津话“何、嘛”的谐音记写，即“猴年马月”实为“何年嘛月”，而“驴年马月”则是根据“猴年马月”加以比附而衍生出来的。“何年嘛月”到“猴年马月”的变化，词的内部形式和意义都发生了变异。⁶⁾

地名因各种原因改换谐音字，使得地名理据消失，词的内部结构和内部形式也相应发生变化。如“裤子胡同”改为“库资胡同”、“裤腿胡同”改为“库堆胡同”，等等，“库、资、堆”实际上都由语素音节变为非语素音节，因为“库资、库堆”在意义上都是囫圇一团、无法组合或组合以后的意义似是而非。中国北方有很多“张各庄、李各庄”之类的地名，其中的“各”是连读音变造成的

6) 坊间曾有所谓“大师”解说何为马月，纯属个人演绎，不足采信。

“家”的语音变体记音字，由于用字的改变，地名的内部结构、内部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从字面意义上已难以分析地名的命名理据。台湾的高雄原名“打狗”，由于闽南话“打狗”的发音同日语汉字“高雄”(たかお, takao)相近，“高”在日语中训读为たか，“雄”的音读为お)，日据时期将“打狗”按读音折合写成“高雄”，一直沿用了下来。“高雄”其实是囫圇一团的，其意义不能按照汉语字面意义来理解。从“打狗”到“高雄”，内部结构和内部形式发生了“重新分析”(Reanalysis)。7)由于多种原因，如出于习俗上避污秽、避忌讳、求雅致、求吉利等原因，或因不知道本字怎么写，或求书写上的简便，等等，很多汉语地名改用同音字或俗别字、音近替代字记写，因而使得原本内部形式清楚、表义明确的地名变得面目模糊、意义不清，导致内部结构、内部形式产生“重新分析”(Reanalysis)。8)

仿译的外来词也有因用字的原因而使词语的内部结构和内部形式发生“重新分析”之例。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圆珠笔”和“原子笔”这两个异名的形成。“圆珠笔”本是英语词ballpoint pen的仿译词，“圆珠笔”有一异名“原子笔”。历来对“原子”的解说有不少跟“原子弹、原子核”的“原子”联系起来的演绎。9)其实，“原子笔”中的“原子”跟“原子弹、原子核”中的“原子”毫无关系，而只是上海话口音“圆珠”二字的俗别字或音近替代字。换句话说，“原子”二字都只是记音字，“原子”在意义上其实是囫圇一团的。从“圆珠笔”到“原子笔”，由于用字的原因，内部结构、内部形式都发生了“重新分析”(Reanalysis)。新近几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已删除“原子笔”这一词条。

7) 坊间一说“打狗”也是闽南话记音字，倘若如此，其命名理据则有待进一步考证。

8) 这里附带一说的是，有些方言调查著述记录的方言词，其实有本字，与普通话语词的差别仅仅在于语音的不同，但不用本字记写而用音近替代字记写，词的内部结构、内部形式显得漫漶不清甚至一片混沌。到底什么是方言词？值得厘清。

9) 把“原子笔”得名之由与“原子弹”或“原子能”联系在一起的传说有很多，但都是受字面形式的蛊惑而产生的臆测或演绎。

Ⅲ. 从汉字所使用的符号看汉字造成词语“重新分析”

从汉字所使用的符号层面看，形声字占了大多数，由此造成了声旁表音、形旁表意的汉字心理。但是，声旁固然不一定能够准确有效地表音，形旁也不一定能够恰当地表示字义类属；更由于形旁的使用，或导致单字记录的语言单位的意义、功能虚化，或使单字的“形”与义不对应，由此造成语词的内部结构、内部形式或者完全消失，或者部分地变得难以分解、组合。

在造字、用字的过程中，人们总是习惯于用形旁显示字义类属，这样做有时却不免“画蛇添足”，反而导致语素音节的非语素化，使得词语内部结构和内部形式消失。四川峨眉山本为“蛾眉山”，因山峰相对如蛾眉而得名，好事者把“蛾眉”改写为“峨眉”(或“峨嵋”)，改换形旁的结果反而使山名失去了命名的理据，“峨眉、峨嵋”都失去了内部结构和内部形式而连绵不可分。

又如湖南九嶷山，“九嶷”本为“九疑”。《史记·五帝本纪》：舜“南巡守，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九疑”的意思是疑为舜葬之处很多)。在“疑”字上加上“山”字头，“九疑”变成了“九嶷”。本意是以“形”显义，却使字义变异，词义也随之发生变异。“九嶷”的意义在字面上无从解释，内部结构和内部形式也就模糊不清、难以分析了。如以“九疑”释“九嶷”，就只是解释“九疑”，而不是解释“九嶷”。类似的例子是很多的，如武汉大学所在地珞珈山，本名“罗家山”，¹⁰⁾“罗家”谐音记写为“珞珈”，两字的意义连绵不可分，遮盖了命名的理据，也就失去了内部结构和内部形式。

在现代汉语中，“琵琶”(pí·ba)是个最小的语言单位，不能从“琵琶”中切分出“琵”、“琶”，因为“琵”、“琶”都没有独立的意义，整个词项内也无结构关系。然而，从语源看，“琵琶”本作“批把”，“批”和“把”两个音节分别表示“弹”

10) 《朱东润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178页)：“武汉大学的新址决定以后，地名也改过了。新郑湖称为东湖，因为是在校址以东，这还可以说出理由。罗家山称为珞珈山，大约和高籁体的雅号，出于同一个思想体系。为什么称珞珈呢？称‘落伽’不是还有些依傍吗？但是改定名称的先生们一心忘不了金呀、玉呀，所以搅出这个不明不白的称呼。”

和“挑”。汉刘熙《释名·释乐器》：“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汉应劭《风俗通·六·声音·批把》：“谨按此近世乐家所作，不知谁也。以手批把，因以为名。长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与五行，四弦象其时。”这说明pi·ba(琵琶)这个乐器名的两个音节并非从来都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原先代表的是两种演奏手法，而这种乐器正是以这两种演奏手法来命名的。¹¹⁾因此，“批把”是有内部结构、内部形式的，而“琵琶”是囫圇一团的。从“批把”到“琵琶”的变化，内部结构、内部形式发生了变异。在造字命名的过程中，添加形旁以示词义，却可能反而模糊了词义理据，从而导致词语的内部结构和内部形式发生“重新分析”(Reanalysis)。

语素虚化是联绵词的形成原因之一。语素虚化有不同的动因，其中用以记录语素的汉字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联绵词一旦具备专有的书写形式(尤其是组成联绵词的两个字使用相同的形旁)，词义往往就囫圇一团的了。例如“委蛇”本是复合词，《楚辞·离骚》“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用蛇的屈曲延伸比喻屈曲绵延貌。“委蛇”写成“逶迤”后，意义无从分解，“逶”和“迤”也都无法与其他语素组合，复合词“委蛇”就变成了联绵词“逶迤”。类似的例子有不少。由于特定的字形在表义方面具有专化(Specialization)作用，阻碍了字所代表的语言单位发展出进一步的组合功能，由此导致了词的构成成分的意义虚化和词语的内部结构、内部形式的消失，整个词在意义上也就囫圇一团、不可分解了。

还有另一种情况，由于单字所使用的字符的改换，使得本来联绵一体、囫圇一团的词语分解出内部结构和内部形式。例如“零落”是联绵词，两个音节两个字只表示一个意义，改写成“零落”后，词义不再“联绵”，由字面意义(“零”有“零碎、零散”义，“落”有“落下、错落”等义)产生了“稀疏不集中”义(枪声零落；村庄零落地散布在河边)。词义发生了变化，“零落”这个词也就因有内部结构和内部形式而归属复合词。

11) 杨锡彭，《汉语语素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41页。

IV. 总结

从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符号的符号这一层面看，绝大多数单字都是音、义、形(字形)三位一体的，因此造成了每个字都有意义的汉字认知倾向。在这一认知倾向的驱动下，没有意义的字也会变得有意义，从而使复音单纯词分解出内部结构和内部形式。另一方面，虽然绝大多数单字都是有意义的，但有意义的单字也可以作为纯粹的记音符号来使用，作为记音符号的单字原有的意义却歪曲了词的内部形式或单字记录的语言符号的音形义关系，从而使语词的内部结构、内部形式发生变异。从汉字所使用的符号层面看，形声字占了大多数，由此造成了声旁表音、形旁表意的汉字心理。但是，声旁固然不一定能够准确有效地表音，形旁也不一定能够恰当地表示字义类属，更有可能由于形旁的使用，或导致单字记录的语言单位的意义、功能虚化等变异，或使单字的“形”与义不对应，由此造成语词的内部结构、内部形式或者完全消失，或者部分地变得难以分解、组合。从上述方面理解，由于字的使用导致词语内部结构、内部形式的“重新分析”(Reanalysis)是值得全面、深入地加以探讨的。

<References>

1. Liu Shuxin. "Fuheci Jiegou de Cihui Shuxing". *Zhongguo Yuwen* vol.4, (1990).
2. Qiu Xigui. "Hanzi de Xingzhi". *Zhongguo Yuwen* vol.1, (1985).
3. Sun Chaofen, "<Xuhualun> Pingjie", *Linguistics Abroad* vol.4, (1994).
4. Yang Xipeng. *Hanyu Yusu Lun*.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5. Yang Xipeng. *Hanyu Wailaici Yanjiu*.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07.
6. Zhao Yuanren(Lü Shuxiang), *Hanyu Kouyu Yufa*. The Commercial

Press, 1979.

<参考文献>

1. 刘叔新, 《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 《中国语文》第4期, 1990年。
2. 裘锡圭, 《汉字的性质》, 《中国语文》第1期, 1985年。
3. 孙朝奋, 《〈虚化论〉评介》, 《国外语言学》第4期, 1994年。
4. 杨锡彭, 《汉语语素论》,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5. 杨锡彭, 《汉语外来词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6. 赵元任(吕叔湘译), 《汉语口语语法》, 商务印书馆, 1979。

<Abstract>

Chinese characters, as writing symbol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not only record Chinese language, but also have their impacts on the Chinese words. The writing format of particular Chinese characters may alter the inner construction and inner form of words that they represent which results in the reanalysis of inner construction and inner form of Chinese words.

Key Words : 汉字(Chinese characters), 词语内部结构(Inner construction of words), 内部形式(Inner form of words), 重新分析(Reanalysis)

